



白鹿洞书院丛书之二

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

朱瑞熙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宋志教育和中国文化

宋志教育和中国文化



主编：宋瑞熙
副主编：王炳如
编委：王炳如 孙家骅 余光鹏
朱培琪 牛怀林 高长海
李家诚 张才英 王仲文
顾吉良

目 录

前言	朱瑞熙	(1)
朱熹佛学思想渊源与逃禅归儒的三部曲	束景南	(3)
朱熹对时文——八股文雏形的批判	朱瑞熙	(36)
论朱熹的美学思想	宋质奎 黄世贤	(47)
朱熹对两宋之际几个皇帝的评论	曾琼碧	(60)
朱熹与朝鲜书院	邓洪波	(77)
朱熹从政的历史功绩	欧潭生 卢美松	(85)
“意不在鱼”——论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	李科友	(96)
朱熹在福建的史迹	王铁藩	(115)
朱熹经济思想述评	孙家驹	(125)
“义利”新探	焦克明	(134)
义利之辨和义利同善	张志德	(147)
从义利之辨看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黄世贤	(158)
泾清渭浊，高下定分——王维和陶渊明是 如何对待义利的	张章龙	(164)
是诗歌压制了戏剧		
——论中国戏剧形成之晚之原因	陈亚姐	(175)
论鲁迅的历史观及其发展过程	俞兆鹏	(181)
儒家经学流派新论	张志哲	(207)

如何评价八股文	贺汪泽(227)
中国古代“省教育厅”及其长官名目考述	李才栋(250)
佛教对我国古代书院的影响	何明栋(259)
张栻和岳麓书院	朱汉民(272)
汉晋时期江西教育考述	胡青(281)
江右古代书院遗存及其利用	杨风光 李再华(291)
黔中王门与贵州明代的书院	谭佛佑(323)
李烈钧与教育	闵正国(338)
白鹿洞书院史事杂考	石之(346)
福州陈宝琛、谢章铤与白鹿洞书院	林伟功(351)
孔子的私学及其对后世书院的影响	游唤民(357)

前　　言

1988年11月中旬，庐山白鹿洞书院召开庆祝本书院重建大会暨首届顾问、教授座谈会，出席的顾问、教授有三十余人。与会者一致认为，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努力把本书院办成一个群众性的文化学术活动中心；本书院的任务是：广泛联络各地有志之士，深入开展书院教育、朱陆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交流工作；举办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各种形式的讲习班、研讨会；收集整理资料，编纂出版书刊等。会后，书院分别在江苏南京、上海、江西南昌以及本院召开各种研讨会或研讨班，开展学术活动。1990年10月下旬，又在本书院召开庆祝立学10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到会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在历次研讨会上，顾问、教授和各地专家学者提交了许多学术论文，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书院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

顾问、教授和各地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如彼之多，而我们编印的论文集却只能以一册为限，且字数最多不能超过三十万。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所有论文进行认真的筛选。挑选的标准，一是符合书院的宗旨，二是质量较高。现在入选的论文和文章共二十七篇，按其内容大致分为四组：一是有关朱熹的学术思想和活动，二是专论义利之辨，三是经学和文学艺术，四是有关古今教育和书院。

陈慧星教授审阅了本书的部分论文，北京燕山出版社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谨表示谢意。

朱瑞熙
一九九一年九月

朱熹佛学思想渊源与 逃禅归儒的三部曲

東景南

探讨朱熹的理学体系究竟受到佛学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关键是要从弄清朱熹早年出入佛禅十余年的真相及其逃禅归儒的思想演变的全历程入手，探明他的佛学思想渊源。可惜国内外学者对此未予充分的重视，几乎还是一片“空白”，除了一些泛泛考论，便是一些无实据的推断，使误说长期流传。如目前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朱熹的佛学思想是来自武夷三先生之一的刘子翬。此说从清人童能灵提出以来，无人怀疑。然而这恰好把事实完全颠倒了。仅此就已可看出我们在对朱熹佛学思想渊源的认识上的严重失误。本文将从勾稽道谦禅师其人入手，提供大量为人所不知的新的重要材料，揭开朱熹师事“谦开善”的千古之谜，并进而对朱熹的佛学思想渊源及其逃禅归儒的思想演变作出全面的新探索。

一、朱熹的禅宗老师——道谦

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给程正思信中，曾明确说到自己早年学佛是学禅宗：“旧日曾学禅宗，故于彼说（按：指陆学）虽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文集》卷五十）少年朱熹的禅宗老师究竟是谁呢？清人童能灵在《子朱子为学次第考》中说朱熹“禅学亦从病翁（刘子翬）来”（卷一），但是朱熹本人

和李侗都否定了这种说法。隆兴元年（1163）朱熹在同汪应辰进行儒释之辩时明白地说：“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按：指从学李侗），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说。”（《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师其人”分明就是说在学佛上师事过禅师，非指病翁刘子翬不言而喻。这个朱熹的禅宗老师，李侗在《与罗博文书》中一语道破：

“元晦进学甚力……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李延平集》卷一）

这个“谦开善”无疑就是朱熹“师其人”的禅宗老师，朱熹“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可见“谦开善”不是朱熹泛泛问佛学的禅师。“谦开善”就是开善寺的道谦，人们至今没有能弄清他的真面目，甚至怀疑开善寺里有道谦其人，而把他排除在研究之外。其实他就是一代禅宗大师宗杲的高徒，《五灯会元》卷二十径山宗杲法嗣下有开善道谦禅师，对他的悟入径山禅法门有一段生动的叙说：

“建宁府开善道谦禅师，本郡人。初至京师依圆悟，无所省发。后随妙喜（宗杲）庵居泉州，及领径山，师亦侍行。未几，令师往长沙通紫岩居士张公（浚）书，师自谓：‘我参禅二十年，无入头处。更作此行，决定荒废。’意欲无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参禅不得也？去！吾与汝俱往。’师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语元曰：‘我一生参禅，殊无得力处。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应去？’元告之曰：‘你但将诸方参得底，悟得底，圆悟妙喜为你说得底，都不要理会。途中可替底事，我尽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须自家支当。’师曰：‘五件者何事，愿闻其要。’元曰：‘著衣吃饭，屙屎放尿，驼个死尸路上行。’师于言下领旨，不觉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

书。宜前进，吾先归矣。’元即回径山。师半载方返。妙喜一见而喜曰：‘建州子，你这回别也！’……”

祖咏《大慧年谱》则说：“及归，老僧（宗杲）半山亭望见，便云：‘这汉和骨都换了也！’谦闻之大惊。”是称他在禅悟上已经脱胎换骨，这是绍兴八年的事。道谦也有自己的法嗣，同书卷二十道谦法嗣下就有一名吴十三道人：“建宁府仙洲山吴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诸禅，及开善归，结茆于其左，遂往给侍。绍兴庚申三月八日夜，适然启悟，占偈呈善曰：‘元来无缝罅，触著便光辉。既是千金宝，何须弹雀儿。’善答曰：‘啐地折时真庆快，死后凡圣尽平沉。仙洲山下呵呵笑，不负相期宿昔心。’”称“开善谦”、“谦”、“善”、“开善”、“谦开善”，都指开善寺的道谦。《五夫里志稿》对他另有较详的记述：“道谦和尚，姓游，五夫里人，家世业儒……削发，谒果勤、目杲二禅师，秘传心印，结庵于仙洲山……侍者曰：‘梦行去来，于师何有，独不留一语邪？’师笑曰：‘万法来空，三兴非有，就生于何安着，忍为骇俗态邪？’后二日永寂。道谦送人诗云：‘二三尺雪山藏路，一两点花春信梅，将此赠君持不去，请君收拾早归来。’”（《释志》）²道谦被推为宗杲八大士传弟子之一（《大慧年谱》），张浚作《大慧禅师塔铭》说：“僧俗从师得悟彻者，不啻数十人，皆有闻于时，鼎需、思岛、弥光、悟本、守净、道谦、遵瓌、祖云、冲密，先师而卒。”（《径山志》卷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有《大慧语录》四卷，云：“僧宗杲语，其徒道谦所录，张魏公（浚）序之。”可见道谦编的四卷本《大慧语录》曾单独行世，后来才由道印集道谦、法宏等人所记编为六十卷的《大慧语录》。今尚存有道谦编的《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但道印编集六十卷《大慧语录》已在乾道以后，因此少年朱熹作为圣经随身不离的《大慧语录》，肯定是由道谦编的四卷本《大慧语录》，也应是道谦给他的，这本书成了他

学禅宗的最好课本。道谦作为果勤、宗杲二大禅师的嫡传，深得禅宗秘传心印，参禅悟道，以万法来空为人生真谛；又兼习儒学，融贯儒释；还有自己的传道法嗣，深为朝中宰辅大臣所崇拜，难怪朱熹选中他做为引导自己入佛国法门的导师了。

道谦与朱熹实际是正式的师弟子关系。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翬都是道谦的诗友兼禅友，朱熹最初通过三先生结识了道谦。绍兴八年道谦结束行脚生涯，告别宗杲归居崇安开善寺时，著名诗人吕本中在送别诗中就提到了胡宪与刘勉之：

送谦上人回建州三首

予来不惮千里远，我病可无终岁忧。
相见匆匆又相别，主人无恨客无求。

平生苦节胡原仲，老大多才刘致中。
为我殷勤问消息，十年坚坐想高风。

遥山渡口晚犹寒，道路奔波未许闲。
颇恨独来不同赏，竹舆穿雨上疏山。

（《东莱先生诗集》卷十四）

朱熹后来在《刘勉之墓表》中提到吕本中“有‘老大多材，十年坚坐’之句，世传以为实录”，就指这首诗，这恰好透露了朱熹与道谦之间的密切关系。道谦归五夫里在结密庵前曾先构清湍亭，刘子翬、胡宪、刘子翼都赋诗纪胜（勉之无诗，大概正入朝），当时吕本中寄来一首《谦上人清湍亭》，是了解朱熹师事道谦的学禅地点的宝贵资料：

道人结庵殊未就，先起小亭山左右。
不将溪水灌尘埃，且以清湍为客寿。
云烟晦靄作春浓，草木坚枯办秋瘦。
客来相对两无语，岂有浮辞问时候。

一生行脚如梦觉，天意似于君独厚。
我今留滞未得往，想象此亭如故旧。
再三伸纸诵清诗，已胜开尊饮醇酎。
簾瓢可乐不淡薄，兰菊重生足滋茂。
他时有暇更分题，此游未落诸公口。

（《东莱先生诗集》卷十九）

不久道谦结密庵于清湍亭附近，这个密庵才是朱熹师事道谦学禅受法的“圣地”。后来人们只知道从开善寺寻找道谦，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道谦的踪迹，反而把朱熹文集中不少谈到他师事道谦的文字都忽略了。道谦与朱熹都是五夫里人，密庵就在五夫里仙洲山谷。嘉靖《建宁府志》卷三：“仙洲山，有两峰，一尖一方，下为密庵。”“密庵瀑布，在外五夫里。”《五灯会元》说的“开善归，结茆于其左”，《五夫里志稿》说的“结庵于仙洲山”，都是指密庵。道谦虽然出身于开善寺，但却是密庵的主僧。宋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二提到归建宁筑庵而居的道谦说：

“饶州荐福本禅师，自江西云门参侍妙喜和尚，至泉州小溪。于是英俊毕集，受印可者多矣（按：福本实亦道谦所荐，时在建炎三年，见《大慧语录》，道谦‘荐福本、东林、颜雪巢、空凡二十余人’，可见道谦师宗果甚早）。……寻于径山首众，逮席散，访友谦公于建阳庵中。谦适举保宁，颂五通仙人，因缘曰：‘无量劫来曾未悟，如何不动到其中？莫言佛法无多子，最苦瞿昙那一通。’谦复曰：‘我爱他道“如何不动到其中”，既是不动，如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门拈出来，自然抓着人痒处。’本曰：‘因什么却道“最苦瞿昙那一通”？’谦曰：‘你未生时，吾已三度瞿山庙里退牙了也。’于是相顾大笑。”

这里提到的“建阳庵”就是指密庵（建阳应是建宁之误）。所以朱熹到乾道九年还曾特地转托吕祖谦为这个“谦老”居住过的密庵求庵榜，在给吕祖谦信中说：“密庵主僧从穆近已死，

其徒法舟见权管干。此庵元只作古丞庄屋，如可，且令看守即求一榜并帖付之……但此庵收入亦薄，非复谦老之时矣。”（《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书》之十七，卷三十四《答吕伯恭书》之九，《吕东莱文集》卷三《与朱元晦书》十九）淳熙二年吕祖谦来寒泉精舍同朱熹相聚讲学，他在《入闽录》中对道谦留下一段至关重要的叙述：

“四月初四日，游密庵，距五夫七里。庵乃僧道谦所庐，曾大父遗像在焉。谦歿二十余年。庵前数十步清湍亭，古木四合，泉石甚胜。绕涧百余步至寒亭，面瀑布。庵亦幽静，晚遂宿庵中。”张浚《宗果塔铭》只笼统说道谦卒在宗果之前。据吕祖谦所述，由淳熙二年上推二十余年，则道谦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罗湖野录》卷三更有一段重要记叙：

“建州开善谦禅师，平居不倦诲人，而形于尺素尤为曲折。有曰：‘时光易过，且紧紧做工夫。别无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将心识上所有底一时放下，此是真正径截工夫。若别有工夫，尽是痴狂外边走。山僧寻常道：行住坐卧决定不是，见闻觉知决定不是，思量分别决定不是，语言回答决定不是。试绝却此四个路头看。若不绝，决定不悟……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如何是佛’，云门道‘干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谦之言如云廓天布，以授学者，与夫浮词滥说，何啻天冠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几而卒，于谦虽无恨，惜乎法门不幸耳。”

《罗湖野录》前有序作于“绍兴乙亥十月望日”，乙亥为绍兴二十五年，这同吕祖谦的记载完全相合。《五灯会元》说绍兴七年道谦往长沙时称自己已“参禅二十年”，如以十五岁出家为僧计算，则道谦约生于元祐七年（1092），活了五十多岁。

密庵距五夫只七里，朱熹师事道谦近在咫尺。朱熹集中纪咏游密庵、清湍亭、昼寒亭的诗尤多，向来人们不解其故，原来个

中秘密就在于密庵是他早年向道谦学禅的“圣地”。乾道七年（1171）昼寒亭建成时，朱熹在一首游密庵的长诗中清楚透露了他早年师事道谦的真实情况，至足宝贵：

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分韵赋诗得竹字

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

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

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

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

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

杖履或鼎来，共此岩下宿。

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

茗碗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至今壁间字，来者必三读。

再拜仰高山，悚然心神肃。

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

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

十年落尘土，尚幸不远复。

.....

（《文集》卷六）

朱熹这首长诗，有他手书的墨迹传世，可见他自己对这首诗十分重视，后来鉴藏家世代宝重，清人钱大昕还特为此墨迹题了一跋，可惜谁也没有读懂它。其实把这首长诗同吕本中的诗与吕祖谦的《入闽录》一对照，朱熹师事道谦之谜便大白于天下。昼寒亭就在密庵前数十步，《崇安县志》卷十《古迹》也说：“昼寒亭，在五夫密庵”。亭名朱熹所取。据朱熹的《游密庵记》及有关诗作，游密庵和游昼寒亭、游清湍亭其实都是一回事。“下有云一谷”，指仙洲山方、尖二峰所对峙的云谷。“茅屋”自指密庵，而“道人”则必指道谦无疑。“架亭俯清湍”，指道谦筑清

湍亭，同吕本中说的“道人结庵殊未就，先起小亭山左右”完全相合。“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赋”，指道谦同吕本中、王先生等交游唱酬，论法谈禅。“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斋粥是指僧人的午食与朝餐的寺院生活，两句说破天机，把朱熹在密庵师事道谦学佛参禅的一段历史暴露无遗。朱熹久居密庵寄斋粥的时间，他在另一首《游密庵》诗中说：“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朝跻青冥外，暮陟浮云端。清岚染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岁月如飞翰。中年尘雾牵，引脰空长叹……”（卷六）“弱龄”指二十岁上下，正是他出入老佛的高峰时期。“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是指朱熹陪侍道谦登览吟唱，这些诗显然为了隐去同道谦的真实关系未收入早年诗集，都在《牧斋净稿》中净掉了，但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有一首和朱熹韵的《朱元晦清湍亭》：“……居然鱼鸟乐，正欠幽人住。野僧岂忘机，作亭以兹故。因君赋新诗，我亦梦其处。”查朱熹集中并无处字韵味清湍亭诗，已经亡佚。韩元吉在绍兴十四年来寓居建安，同朱熹关系甚密。朱熹这首亡佚的陪侍道谦游清湍亭诗约作于绍兴十四年至二十五年（是年道谦卒）之间。“十年落尘土，尚幸不远复”，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二《跋朱文公帖》称亲见朱熹这首长诗真迹后题作“乾道七年朔后二日”，但他不知此诗为道谦而作，考辨说：“公初以监岳庙家居，孝宗初政，应诏上封事，至是恰十年矣，故云‘十年落尘土’也。”这种说法与事实完全不合。朱熹在应诏上封事后一年以及乾道元年都有入朝奏事，而且乾道三年又除枢密编修，前后都无“落尘土”的变化，怎么可以拿上封事为分界线来区分呢？监岳庙家居在绍兴二十八年，但这一年以前仕途劳碌奔波正应说是“落尘土”，这一年以后奉祠家居倒不是“落尘土”了。他在绍兴二十三年赴同安任初入仕途，若说“落尘土”，从这一年算起似才合理，但却与“十年”不合。实际朱熹在诗中分明是按时间先后追叙他

同道谦的交游，故“十年落尘土”也分明是为道谦而发，是说道谦卒后自己十余年来忙碌于尘世俗事，失掉了原来同世外高人山林相处、修己养性的情趣，相对于道谦的涅槃升天，自己有“落尘土”之感。诗中“十年”是虚数，道谦卒于绍兴二十五年，下推到乾道七年朱熹作此诗时为十四年。可见“十年落尘土”表达了朱熹在道谦死后十余年来怀念之情。这首长诗隐而不露地对他早年师事道谦作了最好的自我总结，也是对李侗说的“渠初从濂开善处下工夫来”的最好自我说明。

朱熹最初认识道谦是在绍兴十四年移居崇安潭溪以后，他自己提到两人的初识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按：指佛说）。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某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叩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的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随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语类》卷一百零四）大概就在初识后不久，朱熹为了学得“昭昭灵灵底禅”，便来到密庵开始了寄斋粥的学禅生活，把道谦编的《大慧语录》作为自己的佛学启蒙读本，到绍兴十七年已经学禅入门，第二年便凭道谦教给他的禅说一举高中进士。淳祐中尤袤在《题大慧语录》中提到朱熹早年二件学禅的事情说：

“大慧说法，从横踔厉……今举平昔闻见二则：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说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著。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禅学骨髓，透脱关键，此上根利器，于此取足者也。炳早得于潘子善丈云尔。”（《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

尤袤和朱熹是相知尤深的同年，尤炳是尤袤之孙，潘时举（子善）为朱熹精《尚书》学的高弟子，这一得自潘时举亲耳所闻的

传说应是可信的。

朱熹师事道谦学佛，其实是学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工夫。一是学“昭昭灵灵底禅”，也就是学参禅入悟。宗杲径山新派禅宗的特点是主张参悟而反对静坐，宗杲就宣称：“道须神悟，妙在心空体之，不假于聪明得之，顿超于闻见。”李彭老对此击节叹赏说：“何必读四库书然后为学哉！”（同上）所以他们甚至反对静观默照，而用谁也不懂之类的玄秘“话头”，借助神秘的直觉达到豁然顿悟。宗杲的著作与语录中就充斥着这类可供顿悟用的玄妙“机锋”、“话头”。朱熹师事道谦主要致力于向内体悟，即他自己说的“释志趣幽禅”，李侗说的“皆就里面体认”。道谦经常宣扬的四个“决定不是”，就是对他的“昭昭灵灵底禅”与“皆就里面体认”的最好解说。《牧斋净稿》中留下了不少这样的参悟诗。《归元直指集》上还记载一次朱熹向道谦问禅说：“狗子佛性话头未有悟入，愿授一言，警所不逮。”（卷下）完全是一付佛门弟子的口吻。赵州从谂的“狗子佛性”，正是禅宗津津乐道的入悟话头，也是道谦最乐于向弟子大谈的话头。朱熹后来自己也提到了早年向道谦学禅悟的事：

“禅只是一个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这上，只是叫他麻了心，只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乱，久后光明自发。所以不识字底人，才悟后便作得偈颂。悟后所见虽同，然亦有深浅。某旧来爱问参禅底，其说只是如此，其间有会说者，却吹嘘得大，如果佛日之徒，自是气魄大，所以能鼓动一世。”（《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这实际是他对道谦“昭昭灵灵底禅”的一种亲身体验。洞山“麻三斤”，云门“乾屎橛”，也是宗杲向道谦单传秘授的话头、机锋，而由道谦记录下来的。宗杲有一次向道谦说法：“洞山麻三斤，将去无星秤子上定过，每一斤恰有一十六两，二百钱重，更

不少一毫。正与赵州殿里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锯解秤槌，却教人理会不得。如今若要理会得，但问取云门乾屎橛。”（《五灯会见》卷二十《径山宗杲法嗣·开善道谦禅师》）朱熹生平没有见到过宗杲，“麻三斤，乾屎橛”的呆守法应是出自道谦的亲口传授，这里朱熹说的自己早年所爱问参禅的“杲佛日之徒”首先是指道谦了。禅悟强调心定，“把定一心”，以心悟道，也就是宗杲说的“道须神悟，妙在心空体之”，所以他们主张悟道必须“心源”澄明，昭昭灵灵。朱熹早年学禅宗就是从这里入手的，他的《牧斋净稿》作为师事道谦的产物，可以说就是一部体验以心空悟的参禅诗集。其中有一首《试院杂诗》之二：“寒灯耿欲灭，照此一窗幽。坐听秋檐响，淋浪殊未休。”朱熹就颇自得意地对学者说：“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净者不能道。”（《鹤林玉露》甲编卷六《朱文公论诗》）这恰好说出了他早年跟随着道谦学禅的秘密。难怪李侗说他确实掌握了这种“皆就里面体认”的工夫。

二是学融贯儒佛老，和会三道。宗杲与道谦都是以佛兼儒老的高手，在朱熹大量阅读的“仙经”中，有两部他最喜爱的通俗佛书，这就是宗杲的《正法眼藏》和道谦记录编定的《大慧语录》。道谦要他从中学习不著痕迹援佛入儒的妙法。后来朱熹在给孙敬甫信中说：“（熹）少时喜读禅学文字，见果老《与张侍郎书》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却用儒家言语，说向士大夫接引。后见张公（九成）经解文字，一用此策……但果老之书近见《藏》中印本却无此语，疑是此徒已知其髓，而阴削去之。然人家必有旧本可考。”（《文集》卷六十三）又在《辨张无垢中庸解》中说：“某释之师（宗杲）语之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开导之际，当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途同归，则世出世间两无遗恨矣。然此语亦不可使俗辈知，将谓实有恁么事也。’见大慧禅师《与张侍郎书》，今不见于语录。”